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判丛书

丛书主编 李春青

重回天人之际

反思新时期
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换

刘思宇 著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Serie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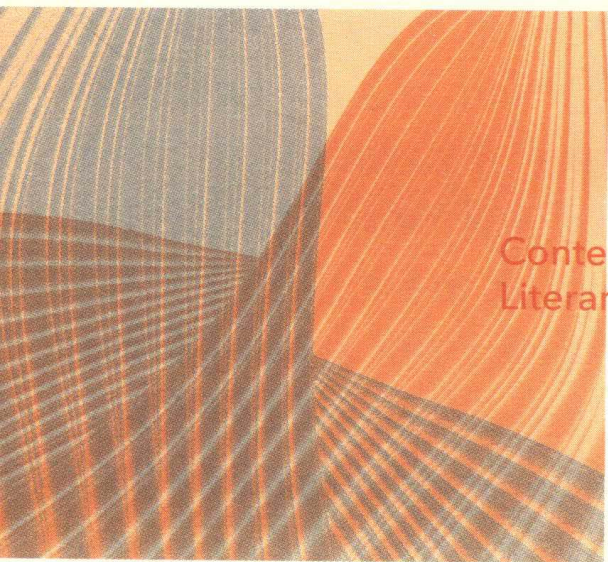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判丛书

丛书主编 李春青

重回天人之际

反思新时期
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换

刘思宇 著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riticism Serie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回天人之际：反思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换/刘思宇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判丛书)
ISBN 978-7-303-23289-5

I. ①重…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2384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CHONGHUI TIANREN ZHIJ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 mm×980 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36 千字
版 次：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策划编辑：周劲含
美术编辑：王齐云
责任校对：段立超 陈 民
责任编辑：王 宁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直承具有天地之大德与文治武功的“文”的核心内涵发展演变，作为时代精神之高标，对古代社会思想影响之深远甚至大于哲学与政治。而随着现代以来西学冲击所带来的学术格局的变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核心话语资源的古代文论及其研究一直处在失语的焦虑之中。此书对新时期以来中外学界中国古代文论文本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转变历程，以及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转换历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中国与世界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结合对古代文论言说与接受的时代语境还原，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文本的特殊性，及其在国学与西学争锋的当代中国，在文化心态日趋开放和多元的当代世界的独特价值。

作者简介

刘思宇，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学、文学理论；主要开设文学理论、文化诗学专题等中文课程，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英文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理学语境中诗的话语力量与朱子诗的美学境界赏析”。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判丛书》

总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新时期文学理论东摇西摆地走过了近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当年那些叱咤风云、无比真诚地探寻“文学本质”“美的本质”“文学规律”以及“创作的奥秘”的领军人物们如今都已入耄耋之年，其中许多人已经逝去了。而当年那些初出茅庐，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激动得脸颊潮红的热血青年们，如今也大都满脸褶皱、两鬓斑白，盘算着退休后的日子了。时光如水，思之令人心颤！然而文学理论向何处去以及相连带的中西问题、古今问题等当年曾经纠缠过老一辈们的困惑，却像服了长生不老药一样依然健在着。莫非困惑注定是当代中国学人的宿命吗？

对文学理论近四十年来走过的道路，学界早就开始反思了。现在我们对当年围绕“审美本质”“审美意识形态”“主体性”“方法热”“向内转”等话题的讨论已经清楚地明了其缘由与得失。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等也早成了令人生厌的老话题，甚至连“理论之死”“后理论时代”等提法，也很难吸引人们的眼球了。新一代学人越来越注重对各种当下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而不再热衷于纯理论概念的炒来炒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更加困惑了：这门学问真的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这就意味着，反思与批

判依然是当今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走过了近四十年的历程，我们的文学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西化”了？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今日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我们的文学理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是必要的吗？如果是必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只有通过反思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我的老师童庆炳先生曾多次给我打电话，嘱我一定要组织一套丛书，专门探讨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有责任对当下文学理论领域重大问题展开研究并做出回应。他甚至帮我策划这套丛书的具体内容，还亲自帮我邀请了一批作者。在老师的一再催促下，我拟定了十五个选题，分别确定好作者，并且于2015年上半年申请到北京师范大学的自主科研项目支持，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按照童老师的设想，这套书2015年初布置下去，作者们用三个月时间收集资料，三个月时间撰写初稿，再用三个月的时间修改润色，到年底就可以完成。他老人家想得过于乐观了，时至今日，整整两年过去了，我们仅仅完成了六部。而且据我所知，这六部书的作者几年前在这方面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可以说，这六部书都是厚积薄发的产物，并非急就章。

《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在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建设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像童庆炳先生这样的学者在学术上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教材编写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教材引领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普及了文学理论知识。而从另一方面看，教材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在不同阶段的最佳标示，清晰地呈现了文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

变。蔡莹副教授的《在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建设四十年》正是对《文学概论》教材的专门研究，其学术意义自不待言。“文艺心理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被称为“显学”，有大量的论文、著作以及相关译著问世，并形成了若干近乎学术流派的研究团队，鲁枢元、童庆炳、畅广元、王先霈等先生分别是各个团队的领军人物。文艺心理学研究与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关涉甚广，是我们考察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绝佳视角。田忠辉教授的《探究隐秘世界的努力——中国当代文艺心理学研究反思》对当年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核心话题、学术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古代文论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近四十年来有大量成果问世，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而且古代文论还是当下文学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从这个角度看，刘思宇博士的《重回天人之际——反思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方式的转换》的学术意义就不只是对学科史进行知识梳理，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典型”这个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系统中曾经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围绕这个概念形成的典型论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和思考方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典型论还可以被视为是文学参与国民想象的一种文化实践，是文学对中国国家现代转型要求形塑现代国民的一种回应。典型论在中国发生和衍变的曲折过程，正是中国国家现代转型艰难历程在文学理论上的折射。薛学财博士的《想象国民的方法——典型论在中国的兴起与衍变》一书绝不是简单的“旧话重提”，

而是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新阐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文学理论界，“反思”就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甚至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反思性文学理论”。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以文学理论自身为研究对象，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学科走向自觉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彰显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历史感，其所建构的反思性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甚至代表了文学理论的一种发展方向。故而，对“反思”的反思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肖明华副教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问题研究》对这种“反思性文学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批判。就当代中国文论所面对的思想资源而言，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传统，西方文论是一个传统，在中西融汇中形成的现代文论是另一个传统。中国当代文论正是在这三大传统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的创构。因此，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放置于中国现代以来新的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来审视，追问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形成的历史原因与文化渊源，进而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形成的学术轨迹与其所隐含的文化逻辑，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李春青的《新的学术传统之创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学术轨迹与文化逻辑》在这方面展开了讨论。

时光飞逝！转眼间童庆炳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了。他的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做学生的无能，无法圆满完成老师交给的重任，只能以这套小丛书聊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李春青

2016年12月12日于北京京师园

目 录

导 论 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1
第一章 从“古代文论”到“古代文学理论”的转变	46
第一节 “启蒙”对“学术”的重塑：从“整理国故”说起	47
第二节 古代文论的精神潜流	60
第三节 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以批评史的书写为例	92
第二章 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跋涉	111
第一节 复兴的理想与时代的召唤	111
第二节 古代文论阐释的方法探索之路	118
第三节 对文化诗学的进一步探索	146
第三章 古代文论的海外研究	182
第一节 在区域研究、海外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之间	183
第二节 海外研究的高明之处	188
第三节 海外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	197
第四节 方法的历程	213

第四章 “数字人文”和大数据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246
第一节 “数字人文”简介	248
第二节 大数据分析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一个例子	256
第三节 “数字人文”中几种常见的量化方法简介	280
后 记	295

导 论 从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一、当代语境中古代文化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国学热一直到现在，有关“国学”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日新月异，各个高校及地方纷纷建立国学院或者特定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不断再版自不待言，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也是急速涌现，光是每年出版的大部头古典文化研究丛书已是不计其数，更遑论古代经典著作缩减版，以及现代阐释类书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势头一片大好自是毋庸置疑，可与之不相称的却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领域似乎并没有借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东风而生机勃勃。与之相反，多数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古代文论的当代失语症”等话题进行，似乎从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持续至今的大谈国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历经兴衰沉浮，有低谷，有高潮，有没落，有繁荣，却无时无刻不“焦虑”着。

低潮时期自不待言，彼时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革命”，随后便引发了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整理国故”运动，研究者们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焦虑可见深切。直到今天，学者们对当初的变革几经反思，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

立……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为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①。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白话现代语言体系”当中，古代文论也仍是“印象式的批评”和“无逻辑规则的审美”，这个问题要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依然困扰着当代学者。

即使是在高潮时期，古代文论研究随着 90 年代后期国学热的兴起而繁荣发展，这焦虑也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愈发急切地体现出来。90 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确成绩斐然，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教材、研究专著和古代文学批评史专著不断出现，但也正在此时，研究者们悄悄开始了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影响力甚至是合法性的质疑。这样的焦虑从 90 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借由国学的兴起，加入当代社会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现代性的反思话语当中。1999 年，钱中文撰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认为现代性在中国，一方面出现了照抄西方，以西方现代性为旨归的偏颇；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终结论”思潮来取消现代性的偏颇。中国文论应该克服旧的现代性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弊端，建设新的现代性品格和精神。^②陶水平 2007 年撰文《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近十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学术讨论的思考》，通过对文论领域“现代性”问题的梳理，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具体的方法。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产

① 周仁成、曹顺庆：《在学科与科学之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前考古》，载《求是学刊》，2013(1)。

② 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2)。

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认为古代文论的研究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要注意历史语境；另一方面要超越文论产生之时的特定语境，将审视的视野延伸至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与此同时，古代文论的研究要立足当代问题，使转换后的话语可以直接参与当代批评活动。^① 通过这两篇文章及其他一些使用大致相同思路的研究专著，^② 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希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互动，以及参与当代社会批评话语的强烈愿望可见一斑。然而，强烈愿望的表达实际正意味着话语权的旁落，因为如果按照古代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评论在当时语境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借由对作品的评点而参与人物品评；借由为文学立法而参与为整个社会立法，这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的确，古代文论研究在今天的学术界并未具有像在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和话语权威。从数据上看，当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领域研究论著的引证率远高于古代文论，这与古代文论关键范畴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与“四库全书”中出现的频率形成鲜明反差。从学理上看，当古代文论研究还在纠结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各领域的研究都早已跳出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线性思维，逐渐建

① 陶水平：《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关于近十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学术讨论的思考》，载《东方丛刊》，2007(1)。

② 相关文章兹举数例如下：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4)；刘永成：《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载《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3)；李艳丰、段吉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目的、内涵、策略与意义》，载《美育学刊》，2014(3)；管勇：《“存活论”的新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中心》，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等等。

立起“多元现代性”理念，讨论如何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来看待中国近现代学术和社会的发展。^① 取消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国学”甚至整个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的合法性都受到了热议，借着 90 年代国学的兴起而重新繁荣起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在这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语境中将何去何从？摘下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古代文论话语将如何面对话语权威的日益失落？古代文论的言说对象到底是谁，它是否必须或者只能用来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当代文学批评和古代文论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厘清？古代文论与国学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类别之间的关系是否也需要厘清？尽管有 80 年代的“文化热”和 90 年代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国学热”，但古代文论学科虽有发展却也一直没有摆脱话语权旁落的焦虑。因为古代文论虽已独立成科，但其兴衰沉浮一直是依赖于其他学科的，没能发掘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所以兴也失语，亡也失语；兴也焦虑，亡也焦虑。这种根基不稳的情况或许源自五四以来的西学冲击，也因当代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日益变动的社会形式和日益多元的研究方式的转型，而日趋明显地显现出来。

当代国学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对发展方向的探索，杜维明主推儒学的文化内涵，提出“东亚儒学文化圈”“文明的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一系列儒学的当代命题；成中英坚持开拓传统文化的哲学内涵，用纯哲学的对话将国学思想推向世界；国学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讨论以古代话语服务于当代正义的问题。发展的同时批判质疑的声音也

^①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此起彼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古代文论研究有必要打破现有的类别局限，重新反思自己的独特性，有必要梳理自己从古到今一路走过的历程，在新时期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只有这样才能不依附，有自信，主动参与而非被动回应当代学术的对话，才能有自我，不焦虑，图得更远的发展。

二、古代语境中文论的重要地位

如果仔细回顾和探索古代文论在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仅对文学领域，甚至对整个社会价值和风尚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与今天文论话语在引导社会观念上的边缘化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徐复观在《中国文学精神》开门第一篇谈“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时对《毛诗》“大序”进行的细致分析就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大序”在开篇第一句论及诗的起源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解释《诗经》中风、雅、颂不同的内容和功能时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这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发表评论，实际却为之后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的写作设定了标准，甚至通过为文学立法进一步影响了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根据徐复观的分析，“作诗者虽系诗人之一人，但此诗人之心乃是一国之心，即是说，诗人的个性即是诗人的社会性。诗人的个性何以能即是诗人的社会性？因为诗人是‘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即是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的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

升华后的社会的心”。^①这样，“大序”虽是说诗，却对作者自身在写诗之外的个人素质和社会关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诗人的心，以形成诗人的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这从表面看，是诗人感动了读者，但实际则是诗人把无数读者所蕴蓄而无法自宣的悲欢哀乐还之于读者。”^②这样，通过对《诗经》的阐释，“大序”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写作的内容进行了引导，同样对诗人整体的精神取向进行了设定：伟大的诗人同时也必须是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对社会状况有着深切的关怀、能够与芸芸百姓休戚与共的人。“而诗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诗之所以能成为诗，乃至文艺之所以能成为文艺，必定不是看一二权贵的颜色，而‘必是言当举世之心，动合一国之意’，其根底乃在保持自己的人性，培养自己的人格，于是个性充实一分，社会性即增加一分。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总认为做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分不开，大家应当从这种地方去了解其真实的含义。”^③不仅对伟大的诗人而言，对每一个进行文学写作，甚至是每一个面向公众发言的人来说，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从“大序”的阐释和设定开始，作者做人的境界和作品的境界就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观念因为文学传播的普遍性而扩散到整个社会对人物成就的评判：做人的境界、社会名声与任何的专业成就都是密不可分的。

①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②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③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因此，朱熹的诗歌虽然文学性不强却备受推崇，^① 秦桧的诗歌因为对人物本身压倒性的负面评价而几乎未被保存下来，这些类似的状况在整个传统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社会中都随处可见，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人物名望与专业成就被主观地联系起来。与之相反，在西方社会中，巴尔扎克虽然私生活混乱，毫不避讳地追求权力、金钱和上流社会的奢腐生活，却决不影响他成为“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获得雨果慷慨激昂的评价：“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古代中国，甚至当代中国。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③这不仅仅是孔子对诗歌应有功能的设定，同时也是孔子对当时诗歌实际发挥的社会功能的总结。在孔子的诗歌观念中，诗不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不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而是为了感觉到事物，不是将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自足的语言客体，而更多的是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和布瓦诺的《诗的艺术》有着共通之处：写诗更多的是以教益为目标，在孔子那里则集中表现为诗歌修身的功能。这样，诗歌便承担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职能，首要作用在于有效地统一社会价值观念，同时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引导人们达成共识，由内而外地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之

① 例如，陈訢在《宋十五家诗选》中对朱熹诗歌做出这样的评价：“朱子诗高秀绝伦，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跻。至其英华发外，又觉光风霁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载下可想其胸次也。”参见（清）陈訢：《宋十五家诗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6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